

中国当代小说 流变史



崔志远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7.409

14

中国当代小说 流变史



崔志远 徐彦利 李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崔志远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7768-6

I. 中… II. 崔… III. 小说史—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6349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90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庆生

崔志远教授是我相识多年的老朋友。2005年11月，收到他刚刚出版的《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这部48万字的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用张炯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书，也是对我国文学创作会有良好影响的书”。时隔一年半，崔志远教授打电话给我，嘱我为他的新著《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写序，当时我既感高兴，又有点惊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能够出版两部学术著作，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后来待我读完《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校样，才知这部新著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这一课题研究的延伸和深化，而由课题研究所派生的“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这门选修课，已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过七遍。这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这部史著既是崔志远教授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心血结晶，也是继《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之后的又一力作。

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一个时期小说创作成就之大小，是衡量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就当代中国小说而言，尽管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总的发展趋势仍是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面对繁复多姿、异彩纷呈的小说世界，作为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理应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今，加强当代小说的研究。据我所知，这一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1981年在庐山召开学术年会时，就提出了编写《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的计划，经过几年的努力，汪名凡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史》、卢启元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史》、高文升主编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王晋民的《港台文学史》等史著于90年代初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姚雪垠在《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总序中说：“一切历史的编写，有一个总的目的，也是一个基本要求，即是为当前服务。古人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又说‘鉴往知来’，都是说对历史经验的探索与总结，要为推

动今天和将来的社会活动起指导作用。编写当代分类文学史的基本目的也是如此。”此后，关于当代小说史的研究，已有多部著作面世，如金汉的《中国当代小说史》（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应锦襄、林铁民、朱水涌的《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张学军的《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刘克宽的《当代小说艺术形态散论》（齐鲁书社 2002 年版），吴培显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程文超、郭冰如的《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许志英、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汤哲声主编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等。这些论著研究的视角不同，重点不同，但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其间既有中国当代小说的整体研究，也有分阶段的研究；既有历史的美学的研究，也有文本艺术研究。从总体看，当代小说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化，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相对地看，近年来历史的美学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的深度也有待加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是由文本关注到历史文化关注。西方由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兴盛半个多世纪的形式主义批评已趋衰落，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历史文化批评勃然兴起，中国当代文学自 80 年代末的先锋小说之后也开始向现实和社会回归。对当代小说史的历史美学研究，无疑应当受到重视。特别是在当前“祛历史”、“祛精神”成为一种时尚的情况下，迫切需要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以历史的美学的眼光对当代小说进行整体性把握。《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则在这方面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和探讨，同时，也兼有思潮流派和文本叙事的研究。

在我看来，崔志远教授的这部著作，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运用整体性研究方法研究当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主要脉络。所谓整体性研究方法，即将当代小说置于 20 世纪的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格局的宏大背景中进行分析 and 思考。“引论”便运用这种方法，在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格局三维坐标系中研究 20 世纪文学，勾勒出其发展的主要脉络：“五四时期出现启蒙

现实主义，创作实绩是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为鲁迅。30年代出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实绩是革命文学，代表作家为茅盾；同时，启蒙现实主义仍在发展；两者共创30年代文学的辉煌。40—7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创作实绩是工农兵文学；启蒙现实主义则处于低迷和压抑状态，乃至进入‘潜在写作’。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启蒙现实主义得以复兴，创作实绩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80年代中后期出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潮起潮落，其创作实绩是现代派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90年代以来的文学出现多元发展的局面，多元中有着回归写实的倾向，如新写实小说的生存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分析现实主义，女性文学的私密写实，新历史小说的碎片写实，晚生代小说的欲望写实，新新人类小说的时尚写实等。”了解了这一脉络之后，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在20世纪文学中的地位就清晰地揭示出来。此外，本书的“结语 建构现实主义主潮与西方文学新潮的互动关系”也运用这一方法，对21世纪文学的发展进行展望。总之，这部著作运用整体性方法揭示出当代小说发展轨迹和基本规律，并确定研究的基本思路。

为了更好地勾勒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著者还运用整体性方法对当代小说进行了多方位的整合。即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整合，十七年文学、“文化大革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整合，新时期小说多种创作思潮的整合。这一整合一方面从纵向上阐明了当代小说发展的传承关系，说明当代小说出现今天这样繁荣的局面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承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从横向上说明新时期小说尽管旗号林立，各具风采，但各阶段每一种小说现象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和前后联系。通过上述从宏观到微观的层层整合，比较清晰地显示了文学的发展流变和内在关联，当代小说不再是互不相关的甚至反差很大的几个板块，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

二是运用多重理论批评视角考察研究当代中国小说的发展。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动，外来文化和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以文学研究新方法的探讨为前导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的变革，突破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单一视角，改变着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面貌。当今的文论建构学派众多，研究方法多样。既有传统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也有过去早有而未能普遍应用的比较文学方法，更有人本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审美主义文论以及系统网络分析法、结构功能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无序有序过程法、模糊分析法，等等，这些方法虽然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我国的各种文学批评视角在中西文

化交流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为文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著作在充分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主要采用历史主义和审美主义视角，但同时也涉猎文本主义、文化主义和人本主义等批评。如此，既能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又能描绘其多彩风貌。具体地说，本书对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性考察后，确立现实主义是其主潮。作为美学和历史批评的现实主义理论便是一个重要视角。本书对现实主义进行梳理考察后，认为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在认识方法层面上，强调客观写实原则；在艺术思维方法上，强调典型化思维；在艺术手法层面上，强调细节真实的写实手法。以此评判当代小说作家作品及创作思潮，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如对工农兵文学、新写实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析等。同时，当代文学发展除现实主义主潮外，还有各种创作思潮，诸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因而又用各种新潮理论进行研究分析。如用文化主义理论分析寻根小说，用后现代主义理论观照先锋小说，用存在主义观照新写实小说，用新历史主义观照新历史小说，用女权主义观照女性小说等。这些对位性分析可称为同向研究。本书在同向研究的同时，还运用错位性分析，即在同向研究中融入反向研究，如以新潮理论观照现实主义创作，或以现实主义理论观照新潮创作，如此，可透析研究对象的缺陷和误区，以引起读者的警觉。前者如以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剖析工农兵文学中革命历史小说的人本关系结构，概括出其英雄引路人模式，发现其结构的单一性和雷同性；后者如分析新历史小说《红粉》，在运用新历史主义分析了它放大历史“碎片”颠覆历史“整体”之后，又进行历史主义观照。认为“《红粉》放大的小历史却令人怀疑，不加批判地书写妓女心甘情愿地恢复昔日的生活，向读者述说，做妓女比摆脱妓女生活更幸福，沦落比新生更有合理性，从而颠覆新中国成立初期妓女改造的大历史。这种意识形态性实不值得恭维，这种‘新’实在是一种‘旧’，甚至连《卖油郎独占花魁》都不如。”这些分析无疑是有见地的。

三是把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流变的内在成因。就当代小说研究来说，微观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宏观是微观研究的升华和提高。这部著作正是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的。在宏观研究上，著者十分注意当代小说发展的整体特征把握，注意小说自身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如研究革命现实主义、启蒙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流变，注意厘清这些创作流派的来龙去脉，探讨他们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衍变规律；在微观研究上，著者十分注意文本的解读，在剖析代表性文本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如分析女性文学的“私密写实”作品，一方面肯定女性文学颠覆男性话语与权威，显示了强烈的现代性精神和自审意识，实现了由写“我们”到写“我”的转变，标志着具有女性意识文学走向成熟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女性“私人化”写作随着自身逻辑的不断演化，逐渐走向私语化、欲望化、肉身化的误区之中，走向荒诞的困境。这些细读文本的评析，切中肯綮，一语中的。

以上简要地概括了这部著作的长处和特点。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长处也有不足。这本史著虽然论述的对象仅是当代小说的主要发展思潮和流派，但涉及的面很宽，需要应答的问题很多，著者虽对当代小说各个时期的创作思潮作了梳理评述，但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未能充分展开，有待进一步深化。还有些问题，著者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是可贵的，但这些见解不一定能为所有人认同。好在现在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求得一律。

总的说来，《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是一部主旨鲜明、视野开阔的书，也是一部内容翔实、颇富创意的书。为了写好这本书，崔志远教授艰苦跋涉，锲而不舍，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仅从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理论著作有一百多种，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著者不仅要占有这些资料，还要在众多的资料中爬梳搜求，梳理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些都非一日之功，它是著者长期积累、缜密思考的结果，体现了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我认为，这种学术精神不仅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需要大力倡导，特别是在当今浮躁之风盛行，功利化、物欲化影响文坛的“文学娱乐化”时代，更需要呼唤和弘扬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

是为序。

2007年5月23日匆写于桂子山

自序

构建当代文学相对稳定的学科形态

在中国文学的各学科中，古代文学较早形成稳定的学科形态：“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的历史分期已形成共识，每个时期都有公认的文学形式和经典作家；现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基本完成学科建构：三个十年的历史分期以及鲁、郭、茅、巴、老、曹、沈等经典作家也大体得到公认。当代文学却处在动荡变化中。在历史分期上意见不一，当前较有影响的几部文学史，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分为两个时期：50—70年代，80年代以来；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1978—1989年，90年代；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则分五个时期：1949—1962年，1962—1971年，1971—1978年，1978—1989年，1989—2000年。在经典作品的认定上，十七年间的作品，较早的文学史关注的是《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三里湾》等，而这并不被陈思和的文学史所看重，陈思和重点分析的《划手周鹿之歌》、《无梦楼随笔》等甚至不为其他文学史提及；新时期各种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在各种文学史版本中更是颇多差异。当代文学研究界还在不断地自我诋毁。“对于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学界因为其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度’影响而否定其文学性；对80年代以后以先锋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学界又因其对西方的‘过度模仿’、缺乏‘原创性’而质疑其价值；对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早有学者以‘新时期文学危机论’而进行全面否定；而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缺乏精神高度’、‘价值混乱’、‘没有大师’、‘没有经典’的指责也不绝于耳。”^①

^① 吴义勤：《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艺研究》2008年第8期。

当代文学学科的不稳定有其客观性因素，它年纪尚轻而且处在不断发展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当代文学已有60年的历史，从1960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著的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算起，当代文学的研究也近50年。半个世纪的研究，理应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形成共识。据此，不得不检讨研究界存在的弊端。

我以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偏颇，则是研究视角的“思潮化”。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往往都以否定此前的思潮为前提，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便不能矫枉”也；文学批评常常为某种文学思潮鸣锣开道，表现出鲜明的“思潮化”特征，尤其是到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新时期，思潮更替频繁，批评视角变化也随之激烈。文学史的研究往往受其影响出现“思潮化”弊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以革命现实主义否定启蒙现实主义，胡风、冯雪峰、邵荃麟以及“百花文艺”时期作家理论家的遭遇便是例证；新时期之初，我们又以启蒙和人性标准否定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热潮，对启蒙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进行了双重否定，与此同时又以文学主体论否定艺术认识论，以文学的文本性否定文学的社会性；90年代以来文学多元发展中，生命本体论和后现代主义大行其道，各种文学新潮如女性文学、新写实、新历史、晚生代、新新人类、“80后”等，以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以本能欲望消解道德与理性，虽表现出艺术的开放性，却导致精神的严重缺失，从而引起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于是，人们又以人文精神缺失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否定……这种狗熊掰棒子式的否定性思维，使我们丧失了现当代文学历史化、经典化的基本前提。

据此，程光炜批评了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他认为，一大批文学批评家，成为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他们的观点、主张、设想和结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成果和结论。^①1988年上海学者陈思和、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不仅形成论争热，而且形成“重写”热。在“重写”标准上，审美标准被突出强调，实际是强调“先锋小说”的标准。杨庆祥说：“‘先锋小说’当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文本本身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强调批评观念上的‘审美’原则和‘文本主义’”，提倡者“虽然比吴亮、程德培等人对‘先

^① 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锋小说’的态度更加谨慎，但同属于上海‘先锋批评’的圈内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在‘重写文学史’中起到不可或缺作用的李劫是当时最活跃的先锋评论家。所以说先锋小说的写作观念和批评方法实际上对‘重写文学史’影响甚大”。^①可见，“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和实施也带有明显的“思潮化”偏颇。文学批评成果虽然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文学批评更关注“当下”，具有不断更迭变化的“思潮性”；而文学史研究更强调理性化的过滤、梳理和反思，强调发掘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和相互沟通，从而建构“史”的体系。笔者以为，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阻碍着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进程，这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然而，文学史研究的批评化，还不是“源”，根本的问题还是确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这是一个融历史、文化、文学于一体的宏大开放体系，又是一个聚焦于“文学”的科学标准体系。不妨将它称为一种“大文学观”。杨义对此阐释道：“大文学观的要点，是它以‘大’和‘文学’组合成词的方式，蕴含着一种在新的时代思想高度上综合思维的形态。一方面，它以‘文学’二字，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的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并且在这种价值认知和科学思辨中严密而深入地展开对于文学个性、流派和分类学上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它以一个‘大’字，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的实质性超越，走出纯文学观，看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超越在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在这一点上，它又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在新的思维高度上兼容了古代杂文学观的博大，从而在现代理性的综合思维中，创造性地还原出文学——文化生命的整体性。也就是说，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混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②

这种高屋建瓴的概括还应进行可操作的细化思考。笔者析出如下方面：

首先，它从历史发展和中西文化浑融的宏阔背景上考察当代文学的自然生成形态，把握其发展规律。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瑟夫·布洛赫

^① 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 and 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

^②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了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 文学的历史亦可以作如是观。如果把这种思想稍加发挥，可以把平行四边形分出不同的层次：众多小的四边形的合力组成较大的四边形，较大的四边形的合力组成更大的四边形……最终由少数重大四边形的合力构成推动文学史的综合力。如此，在思考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向的时候，则要寻找巨大的平行四边形的重大合力。什么是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巨大平行四边形的重大合力呢？黄子平等《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方法论的“整体意识”：“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世界历史的尺度，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置于两个大背景之前：一个纵向的大背景是两千多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一个横向的大背景是本世纪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不单是东、西文化的互相撞击和交流，而且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在本世纪的崛起。”其实，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即20世纪时代生活进程，它对文学的发展更有决定作用。如此，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就成为决定文学发展的巨大平行四边形的重大合力。在重大合力的层面上，存在着这样的合题：文学分别同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时代生活进程的合题，以及民族文学传统、世界文学格局和时代生活进程三者形成的合题。这些合题决定着文学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脉络。

其次，它承认文学的多重本质性。陆贵山提出文学本质的六大学理系统，即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这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有机体系：“从文学产生的根源来说，归根结底，文学和文学的本质是人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从文学自身的本性和特征来说，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文学的自然属性、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文学的人学属性、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学的文本属性和形式语言符号属性，都是通过文学的审美的内容和形式，负载和展示出来的。”^② 基于此，我们不应

^① 刘庆福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② 陆贵山：《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强调文学的某一种本质而否定其他本质，也不应以本质的全面展示为标准对作品进行苛求。因为在文学的发展历史中，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条件不同，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本质可能得到凸显，其他方面的本质可能被弱化。如，工农兵文学更凸显文学的历史社会本质，伤痕、反思文学更凸显人本本质，寻根文学更凸现文化本质，先锋文学更凸显文本本质，地域风情小说更凸显自然本质……只要在某些本质方面取得骄人成就，就应当予以肯定。与此相联系，应包容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类型。当代文坛出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四大文学类型，自然也可说是四种创作方法。虽然现实主义居主流地位，但是浪漫主义，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奇特异的艺术特征的影响，使当代文学的面貌大为改观。因而，既不可用现实主义否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不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否定现实主义；既不可用后现代主义否定现代主义，也不可浪漫主义否定现实主义。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能扎根民族文化土壤，深刻反映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都应予以肯定。

其三，它强调文学的艺术创新性。这是检验各种创作方法在文学的各本质方面所获成就的最重要的标准。何谓创新？列宁曾说，判断历史功绩，不是看他有没有提供现代人需要的东西，而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多提供了多少东西。虽然讲的是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文学历史亦是如此。我们决不可以当今文学思潮的观念和标准来评价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而应将其置于文学历史的长河中，考察这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比他的前人多提供了多少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应该是在文学的各个本质方面的创新。首先，它必须是文学的，而不是非文学的；其次，也不必求全责备，只要是在某些本质方面甚至某一本质方面获得骄人的“新成果”即可。如此，我们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历史具体地考察分析当代文学史中每一种创作思潮，发掘它们创造的“新东西”以及负面教训。这些思潮的“新东西”汇聚而成的“经验成果链”则是当代文学的总体成果，“经验成果链”上的优秀作品均可视为经典，并一步步地经典化；同时，缺失和教训形成的“缺失教训链”则是当代文学的总体教训。“双链效应”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为 21 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借鉴，成为“后世之师”。这样，当代文学学科便会逐步历史化。

有了这样的大文学观，便可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本书着意强调整合性思考，并进行了三个层面的整合。

第一，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整合。这也是对 20 世纪百年文学的

整合，是三个层面中最为宏观的整合。在本书“引论”部分对此将作详细论述。简要说来，笔者运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通过对时代生活进程、民族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格局的研究、分析和整合，梳理出20世纪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多种范式，现实主义始终是创作的主潮。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20世纪文学可析出如下脉络：五四时期出现启蒙现实主义，创作实绩是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为鲁迅。30年代出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实绩是革命文学，代表作家为茅盾；同时，启蒙现实主义仍在发展；两者共创30年代文学的辉煌。40—7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其创作实绩是工农兵文学；启蒙现实主义则处于低迷和压抑状态，乃至进入‘潜在写作’。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启蒙现实主义得以复兴，创作实绩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知青文学等。80年代中后期出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潮起潮落，其创作实绩是现代派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90年代以来的文学多元发展，且有着回归写实的倾向，如新写实小说的生存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社会分析现实主义、女性文学的私密写实、新历史小说的碎片写实、晚生代小说的欲望写实、新新人类小说的时尚写实等。在这个发展脉络中，虽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来居上，其艺术成就成为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艺术资源，但是，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地位。”其中，“五四启蒙现实主义——30年代启蒙与革命现实主义共存——4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30年的演进轨迹；“50至70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启蒙现实主义——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90年代的多元化发展”是当代文学60年的演进轨迹。这些脉络和轨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每一思潮都具有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我们可以分析它、评判它，却不可无视它，摒弃它。

由此获得的一个重要思考是：应当加强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40—7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加之2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革命文学，革命现实主义跨度达半个世纪，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其他思潮都无法比拟的。虽然这一思潮颇多问题与缺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十年走上政治化极端。但作为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的归宿，而且是当代文学的起点，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一笔重要的文学财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惜乎我们曾经绝对肯定它，后来又不屑一顾地否定它，甚至将其妖魔化。殊不知，它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含蕴，已积淀到作家们的心理深层，并不断改头换面地

显影在之后的文学创作中。90年代末以来,有几种文学现象值得注意:(1)“红色经典改编热”。五六十年代表现革命历史斗争的较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如《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铁道游击队》、《红岩》、《烈火金刚》、《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等,21世纪以来几乎都被改编成电视剧。而且在各电视台反复播放,有较高的收视率。一些基本按照革命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电视剧如《亮剑》、《闯关东》等,也风靡一时。个中原因自然很多,然而,其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民族斗争精神,在90年代以来价值丧失、精神萎靡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精神强心剂。(2)《红灯记》等革命现代京剧的“经典化”。几部写革命历史斗争的现代京剧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尽管打上“样板戏”的印记,但剧作中张扬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以及在京剧艺术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的成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戏剧极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剧目仍在不断演出,并成为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等国家级演出团体的“看家戏”。它们作为现代戏的代表剧目逐渐被经典化,同传统戏的经典剧目一起,被不断地传承和发扬。其优秀唱段不仅在晚会上经常出现,而且在公园、街道等休闲场所也常演不衰。(3)底层文学中的“阶级分析”特征。如前所述,底层文学是21世纪规模最大的文学潮流。它着意表现贫富悬殊,写有产者的冷酷与榨取,贫困者的苦难与呻吟。经济能人、厂长、企业家、腐败干部、工头、经理、老板等和贫困农民、打工者、发廊女、按摩女、下岗工人等成为作品中常见的两类形象。两者之间的冲突矛盾明显具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阶级矛盾”特征。罗伟章的《故乡在远方》写大巴山石匠陈早春因欠债出外打工,先是受工头盘剥,干了半月苦力还赔上50元,后又被小老板骗到“黑”采石场(据说是“某局长”所开)做数月无报酬的奴隶,好不容易挣了千余元,突传女儿惨死噩耗,回家路上钱被偷,抢钱误伤人命,被判死刑。曹征路《那儿》中的朱卫国,不能容忍矿机厂改制过程中工人们最后一点房产被无耻剥夺,悲壮地死在空气锤下,完成一曲“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绝唱。这些描写充满着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激烈冲突,使人联想起许多类似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这一特点已被一些学者指出。季亚娅便认为《那儿》“是一部具有左翼文学精神气质和血统标识的作品”。^①

^① 季亚娅:《“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

第二,十七年文学、“文化大革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整合。革命现实主义与工农兵文学经历了十七年的发展与曲折,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畸变”,其极端表现是“阴谋文艺”,文艺由政治家的政治工具变成了阴谋家夺取国家权力的阴谋工具。然而,一年之后伤痕文学却勃然兴起,从思想到艺术都同阴谋文艺形成巨大的反差。这种转向的内在原因在本书的第二章将有详细论述,简要地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两种文化精神:政治文化意识与五四文学精神。前者产生于20世纪前半叶连绵不断的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尤以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为最;后者产生于20世纪一次次文化启蒙运动,尤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最。“政治文化意识与五四文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有深刻的历史依据,也有赖以生存的土壤,它们扎在20世纪作家、批评家乃至读者的心理深层,乃至形成某种集体无意识。一般地说,五四文学精神更关注文学自身的价值和规律,有利于文学发展;政治文化意识更关注历史、社会和阶级斗争,虽然并非文学之累,但是,极端的政治文化意识往往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政治文化意识与五四文学精神都在发挥着作用,二者有时交融,有时对峙,有时冲撞,其不断的对峙、冲撞、交融、消长,构成了一部新中国文学史。”(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十七年间,从“三次批判运动”到“百花文艺现象”,从反右、“大跃进”到文艺政策调整,都可看到二者的冲突和相互消长;60年代前期毛泽东作出“两个批示”,引发出“极左”思潮的泛滥,政治文化意识便占据压倒优势。“文化大革命”期间,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阴谋文艺”,五四文学精神被极端的政治文化意识挤压得已无立锥之地。然而,作为一种民族的文化潜意识,五四文学精神不可消灭,它仍然顽强地甚至扭曲地生长发展着。如电影《创业》、《海霞》,湘剧《园丁之歌》等以“告御状”的方式奇险而巧妙地求得生存,还有铤而走险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更多是以地下状态存在的“潜在写作”。这一切告诉我们,即使在极端政治文化规范的高压下,五四文学精神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如同炽热的岩浆一样在地下运行,寻找着突破口。新时期,社会发生巨变,“极左”的政治文化意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轰然崩塌,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于是,被压抑的五四文学精神以强大的蓄势喷薄而出,引领出启蒙现实主义文学大潮。这便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

从20世纪文学发展脉络看,从五四时期的启蒙现实主义到40—70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再到新时期之初的启蒙现实主义,正好完成了现实主义的一个“大回环”。也就是说,新时期之初的启蒙现实主义,复兴

的是五四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以及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70年代被视为异端的文学思想。它不过是对此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丰富和补充，甚至可以说，它还不是真正的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迈开前进的步伐，当从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热潮算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热潮不免同本土文化矛盾冲撞，于是，90年代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土壤上，传统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交互作用，形成文学多元发展且内蕴写实走向的局面，这种局面持续至今，并未出现新的变化。可以说，由现代主义到内蕴写实走向的多元化，这是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发展走向，也是新时期文学之“新”。基于此，将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的文学分为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理由并不充分，鉴于21世纪文学与20世纪90年代文学并无明显的差异，也没必要将21世纪几年的文学另立新宗。

第三，新时期文学各种创作思潮的整合。新时期文学思潮和流派形形色色，仅小说便有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现代派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女性文学、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新新人类小说、“80后”小说、乡土移民小说等，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旗号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如果沉下心来，将这些小说思潮置于时代、民族和世界的宏大背景中，便不难发现其发展轨迹。上述20世纪文学发展流脉已概括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三部曲：“启蒙现实主义复兴——现代主义的潮起潮落——多元发展的写实走向”。而且在每一部曲中，各种创作现象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1）从启蒙现实主义思潮看，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和延伸，这种发展是由政治反思到历史反思，其前景必将是文化反思，指向寻根小说；与此同时，改革小说由“蒋子龙模式”发展为“高晓声模式”，由关注改革的“外障”到注重表现民族的“心魔”，也指向了寻根小说。寻根小说的产生势在必然。（2）从现代主义思潮看，现代派小说萌生于伤痕小说时期，如王蒙的意识流和宗璞荒诞手法，但多是表现手法的效仿；到刘索拉、徐星才完成了思想观念的进入；残雪则是观念与手法的双重进入。这种现代派小说引领出更加异端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的出现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充满“现代化憧憬”的改革小说走出“蒋子龙模式”之后，开始进行现代化批判，“现代化憧憬”逐渐失去了启蒙力量，从而导致改革小说的衰落；寻根小说祭起现代化武器，提出“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去重新镀亮“民族的自我”，然而，当寻根作家们遭遇强大的传统文化时，“现代观念”也就败下阵来，寻根作家们纷纷放弃启蒙，转向新历史小说。这一切迫使文学摒弃启蒙精神，